

谈谈陈国琅先生旧藏传世孤品明活字本《刘子》

□ 赵前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今日惊悉陈国琅先生仙逝，深表哀思！十几年曾与先生有一面之缘：记得那天我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，同事陪一位戴着眼镜的男士进门参观，经介绍得知是陈国琅先生，陈先生非常和蔼，面带微笑，一直认真听取同事介绍组里情况，临行前还在办公室拍照留念。记得拓晓堂先生和我讲过，陈国琅先生曾服务于美国航天局，但他并没有将其父陈清华先生留给他的珍贵善本古籍留在海外，而是毫不犹豫送回祖国。经文化部、国家文物局、财政部、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共同努力，此批书与其父旧藏珍本在国家图书馆合璧，堪称一段书林佳话。虽然陈国琅先生驾鹤西行，但是他当年毅然决然将自己珍藏的家传善本送回祖国的义举，让人感佩！后来我有幸与陈红彦女史、陈先行先生、拓晓堂先生一起参加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联合编纂的《祁阳陈澄中旧藏善本古籍图录》，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受到好评，泽被学界。也算是为陈澄中先生旧藏善本做了一点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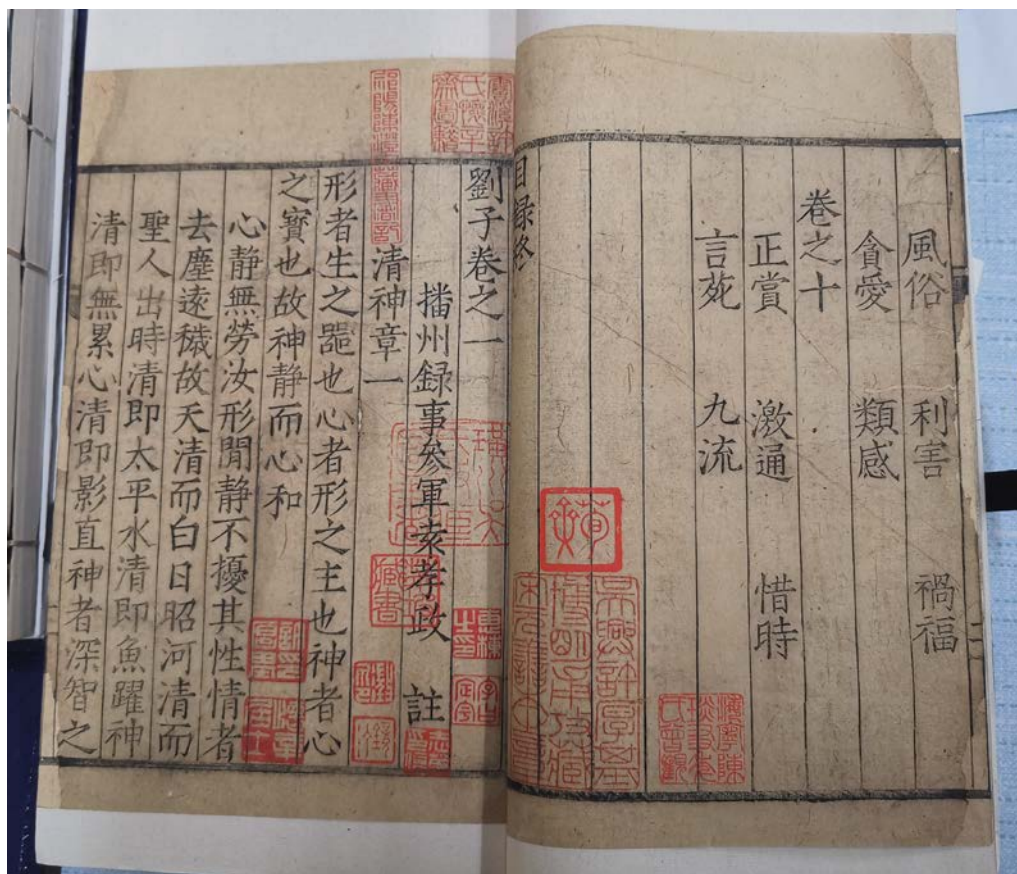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刘子》卷端

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陈红彦女史邀我撰文，因为曾经关注过陈国琅先生收藏的这批古籍善本。此批古籍善本中有一部《刘子》（图1）引起我的兴趣，原著录为明刻本，经鉴定为明代金属活字摆印本，传世孤罕。故命笔撰此小文，以此纪念陈国琅先生。

《四库全书》收录了《刘子》，四库馆臣在《四库全书总目·子部·杂家类一》中，对该书作者进行考证，称：

《刘子》十卷（内府藏本）

案《刘子》十卷，《隋志》不著录。《唐志》作梁刘勰撰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、晁公武《读书志》俱据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序，作北齐刘昼撰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亦作刘昼。自明以来，刊本不载孝政注，亦不载其序。惟陈氏载其序，略曰，昼伤己不遇，天下陵迟，播迁江表，故作此书。时人莫知，谓为刘勰、刘歆、刘孝标作云云。不知所据何书，故陈氏以为终不知昼为何代人。案梁通事舍人刘勰，史惟称其撰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，不云更有别书。且《文心雕龙·乐府篇》称，涂山歌于候人，始为南音。有谣乎飞燕，始为北声。夏甲叹于东阳，东音以发。殷整思于西河，西音以兴。此书《辨乐篇》称，夏甲作破斧之歌，始为东音，与勰说合。其称殷辛作靡靡之乐，始为北音，则与勰说迥异，必不出于一人。又史称勰长于佛理，尝定定林寺经藏。后出家，改名慧地。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，与勰志趣迥殊。《白云霁道藏目录》亦收之《太元部·无字号》中，其非奉佛者明甚。近本仍刻刘勰，殊为失考。刘孝标之说，《南史》《梁书》俱无明文，未足为据。刘歆之说，则《激通篇》称，“班超愤而习武，卒建西域之绩”其说可不攻而破矣。惟北齐刘昼，字孔昭，渤海阜城人，名见《北史·儒林传》。然未尝播迁江表，与孝政之序不符。《传》称昼孤贫受学，恣意披览，昼夜不息。举秀才不第，乃恨不学属文，方复缀辑词藻，言甚古拙，与此书之缛丽轻亦不合。又称求秀才十年不得，乃发愤撰《高才不遇传》。孝昭时出诣晋阳上书，言亦切直，而多非世要，终不见收，乃编录所上之书为《帝道》。河清中又著《金箱壁言》，以指机政之不良，亦不云有此书。岂孝政所指，又别一刘昼欤？观其书末《九流》一篇，所指得失，皆与《隋书·经籍志·子部》所论相同。使《隋志》袭用其说，不应反不录其书。使其剽袭《隋志》，则贞观以后人作矣。或袁孝政采掇诸子之言，自为此书而自注之？又恍惚其著书之人，使后世莫可究诘，亦未可知也。然刘勰之名，今既确知其非，自当刊正。刘昼之名则介在疑似之间，难以确断。姑仍晁氏、陈氏二家之目，题昼之名，而附着其悟如右。

这部《刘子》共十卷，作者北齐刘昼，唐袁孝政注。框高16.4厘米，广12.8厘米，半叶9行，行15字，左右双边，黑口。卷末有黄丕烈一道跋文（图2）。此书钤有：柯氏敬仲（此印伪）、臣陆封声、璜川吴氏收藏图书、惠栋之印、字曰定宇、汪印士钟、阆原甫、潘叔坡图书印、叔坡藏书、汪澂别号镜汀图章、镜汀、澂印、许印厚基、怀辛居士、吴兴许厚基博明甫收藏宋元善本之章、霁溪许氏怀辛斋图籍、怀辛斋珍藏印、许氏秘籍、志万印信、海宁陈琰友先氏曾观。

黄丕烈跋文，称：

《刘子》有宋刊本，系小字。向为五柳居物，后以赠阳湖孙伯渊者。又有旧钞本向为五砚楼物，后以归余者。有旧刻专本，向为香严书屋物，今以售余者。皆昔年事也。春初香严主人歿，遗书分贮各房，有目录传观于外，余遂检向所见过者，稍留一二种。惜年来力绌，宋元旧刻散失殆尽，而此区区旧刻，又复置之。且卖书买书牵补殊坚，自笑兼自媿也。己卯季冬望后一日，复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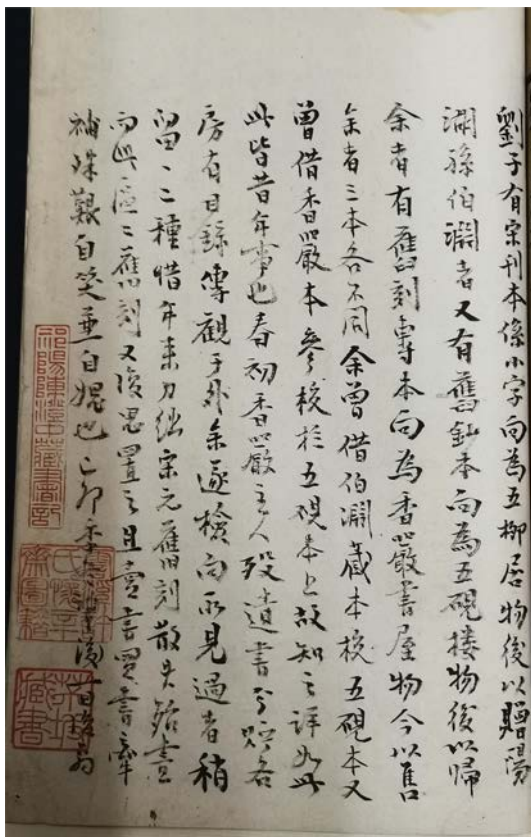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《刘子》黄丕烈跋

众所周知，黄丕烈是清代著名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。通过这道黄跋可知：这部《刘子》原为苏州著名藏书家周锡瓚香严书屋插架之物，周氏歿，其书散出，黄丕烈购藏；黄氏曾将此书与另一位苏州著名藏书家袁廷樵五砚楼所藏钞本《刘子》进行参校，发现异同；黄丕烈题此跋时，是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，此时黄氏已经财力不支，故有“惜年来力绌，宋元旧刻散失殆尽，而此区区旧刻，又复置之。且卖书买书牵补殊坚，自笑兼自媿也”之叹。虽然如此，黄丕烈仍“又复置之”，可见其对古籍的痴迷。该跋文两次提到这部《刘子》的版本，皆称“旧刻专本”或“旧刻”。但是，以我对古籍版本的认知，我以为这部《刘子》绝非刊刻之书，而是摆印而成的金属活字本。

为什么说这部《刘子》金属活字印本？我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鉴定的：

一、根据每版字体受墨状况进行辨别：

这部《刘子》打开后就会发现，每版的字迹有深有浅，墨色浓淡不匀。我们以卷一首页为例，此页面中：第二行的“注”、第五行的“而”、第七行的“白”、第八行的“即”等字，墨色浓重。而第八行的“水清”、第九行“深智”等字墨色浅淡。这是因为活字版是由单枚活字摆印而成所致。不论是什么材质的活字，尽管制字者尽力把每一枚活字修成高矮一致，但是在摆印时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仍然会有高低不平的情况出现，致使同一版面刷印出来的字迹，有深有浅，墨色浓淡不匀。而雕版则不同，无论是独块板材还是拼接而成的板材，在雕版之前，都会采用刮、刨等多种工艺，使版面平整，便于刊刻。因此雕版印出来的书籍，其字迹墨色浓淡基本一致。

二、根据版面是否有断版状况进行辨别：

雕版的木材，一般会选用梨木、杜木和枣木。这是由于其材质具有不同的硬度和吸水性。另外梨树、杜树、枣树在我国北方地区也比较常见，便于就地取材。即便如此，用一定硬度的木材雕成书版，经过多次、反复刷印，也会有字体变形、破损，版面、边框断裂等情况出现。而木活字版在印刷过程中，如果个别活字出现损坏时，可以随时更换。因此不会有字体变形、破损，版面、边框断裂等情况出现。但是多数更换上的新字，不少是临时雕刻而成，所以字体与原来字体不同，这也是辨别木活字摆印本还是雕版印刷本的方法之一。另外，木活字版是靠四周边框和界行固定活字。而四周边框，是由四个与活字同高的边条拼合而成。虽然在印刷之前，边框的拼接处非常严密，但是由于刷印时使用了墨汁，因此木活字版在多次刷印后，活字、边框、界行都会出现膨胀现象，造成活字版边框拼接处有一定的缝隙。这也是和雕版不同的地方，因为雕版的边框是刊刻出来的，而不是拼接而成，即使多次刷印后，也不会有木活字版边框在拼接时出现的缝隙。当然，木活字版刷印多次后，其边框、界行有时也会出现缺损，这就需要鉴定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仔细甄别。金属活字版，即使刷印多次，其边框的拼接处仍然非常严密。不会像木活字版那样，因为多次刷印，活字、边框、界行出现膨胀现象，致使木活字版边框拼接处由于膨胀出现缝隙。这也是区别木活字版和金属活字版的方法之一。雕版的界行由于是刊刻而成，所以都是非常直的；木活字版的界行多数是用竹片或木片制成（极少数用金属制成），所以由于各种因素，会出现弯曲现象；而金属活字版的界行都是用金属片制成，因此可以根据摆字需求弯折。而这种现象，在木活字版中，用竹、木片制成的界行是无法做到的。例如，卷三首叶第六个界行的形状，由此初步推断，这部《刘子》界行都是用金属片制成。

三、根据每行字体排列状况进行辨别：

由于在雕版之前，都会采用刮、刨等方法使板面平整，因此雕版印出的书籍，每行字体都非常工整。而用活字摆印的书籍，在同一行中，会出现字体歪斜不齐的现象。例如，卷三第十九叶B面第二行“晋”，第三行“日、渡、其”；又如，卷三最后一页第四行“审其”等字明显向右偏。此外，在明代其它活字版书籍中，不知何种原因，还有活字被横置的现象。

四、根据书中是否有字形完全相同的单字进行辨别：

如果用活字摆印的书籍中，有两枚或更多活字的字形完全相同时，那么可以肯定此书不是用木活字摆印而成。道理很简单，因为这些活字不是雕刻而成，而是出于同一字模。这种现象，只有在金属活字版或泥活字版摆印的书中才会出现。在这部《刘子》中，刘子目录的“录”字与卷三首页下题“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”的“录”字相同，因此可以判断这部《刘子》不是木活字摆印而成的。

五、根据书中是否有字体异样的单字进行辨别：

在这部《刘子》中的卷一的第一叶b面第七行第一个字是“清”，该字“青”的第三横左侧多出一个黑点；卷二的第二十二叶b面第四行第十个字是“知”，在该字“口”的左上方多出一个黑点，根据艾俊川先生判断，这种现象是流铜的痕迹。另外，卷二的第十七叶a面第二行第六个字是“鞅”，放大后能够看到此字笔画中有白点黑心的现象，这种现象在此书中还有很多，艾俊川先生认为是铸字时出现的气孔。以上的现象出现，只有铸造金属活字时才会有。

综上所述，这部《刘子》应是明代金属活字摆印本。